建道學刊 55 (2021): 3-23

教會中興起的女性講道聲音（Voice）——北美的當代講道學帶給亞洲華人教會之啟發

蔡慈倫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Taiw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一　前言

「女性與講道」是北美當代講道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主題。相較於北美講道學在這個主題上的耕耘及成果，對華人的教會和神學院而言，它仍是一個不太被重視或探討的主題。然而，隨着愈來愈多女性進到神學院就讀，接受傳道人的培育及裝備，在畢業後進入牧會現場成為「上帝話語的僕人」時，這已經是華人教會及神學院不得不正視的一個課題。身為一位女牧師，同時在神學院教授講道學，筆者企圖在此篇論文中整理出「女性講道者」在北美的講道學討論中所涵蓋的一些重要內容，以補充華人教會的講道學教育在這個主題上的不足，以作為對話的開始。雖然北美講道學有其特定的文化處境，西方教會的女性講道者或女性講道學者的經驗，無法完全成為華人女性講道者的經驗，但由於北美學界在這個議題上的研究已有較長的歷史，相較之下有比較完整的紀錄及成

果，或許華人教會及神學院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發。事實上，當我們閱讀一些西方教會女性講道者的奮鬥史時，卻也訝異地發現，自古以來女性講道者所面臨的一些挑戰似乎都很類似，已經跨越了文化的差異。

在本文中，筆者採用的是講道學方法論。根據當代講道學的理解，一個「講道事件」主要包含五個要素：講道者、聽眾、信息、教會的情境、聖靈的工作，這也是講道學探討的主要內容。由於篇幅的限制，筆者把焦點主要放在「（女性）講道者」這個要素上，整理出在當代講道學討論中所涵蓋的一些重要內容。在這些主題的討論中，會涉及從聖經、歷史、神學、實踐等面向的觀點，除了突顯講道學是一門整合性的學科之外，也能深化我們對這個主題的理解。筆者期待藉由此篇論文能拋磚引玉，喚起更多華人教會的傳道人以及神學院的神學教育者關注「女性與講道」這個主題，進而帶動華人基督徒學者能從各個不同領域針對這個主題的探討及研究，以補足華人教會在這方面的不足。在本文的最後，筆者會進一步提出北美講道學帶給華人教會及神學院的啟發。

二 「女性與講道」與當代講道學

（一）「女性與講道」在當代講道學中的發展

今天，學者把「新講道學」的發展主要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開始於六十年代，並在七十年代促成了一股革命，克拉德多克（Fred Craddock）是帶動此一風潮的靈魂人物。第二個時期始於八十年代，奠基於前一個時期所立下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修辭、 故事、想像力、講道與禮拜的關係、女性與講道等主題。[1] 「女性與講道」從八十年代開始成為北美講道學界的一個關注，有幾個主要的歷史背景：

[1] William H. Willimon and Richard Lischer eds.,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eaching*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249-51.

首先，六十年代的美國黑人人權運動直接影響了婦女運動的興起，婦女開始覺醒並追求與男性平等的地位。當婦女反思自己受壓迫的經驗時，她們會發出一連串的疑問：我是誰？我作為一個女性的意義是甚麼？對基督徒女性來說，她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基督教在本質上是否一個壓迫女性的宗教？女性神學在六十年代末期出現，企圖透過女性經驗去反思信仰。

其次，隨着婦女運動的興起，在七十年代愈來愈多婦女開始進入神學院就讀，且人數持續上升。[2] 這些女神學生從神學院畢業後進入地方教會服事，並有更多女性傳道人的講章出版，讓信徒對教會中興起的另一股不同的講道聲音有更多的接觸和了解。

其三，針對女性不同的認知方式之研究。在八十年代關於性別議題的討論，一本極重要的著作是在1986年出版的《女性的認知方式：自我、聲音及心智的發展》（*Women's Ways of Kn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Voice, and Mind*）。此書一出版後，造成各界極大的回響。這本書由四位女性作者共同撰寫，是透過訪查135位女性後所集合而成的研究結果。這本書企圖回答一個問題：女性是否有她們獨特的認知方式，包括：如何理解、聽、學習，及表達？研究對此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這個研究團隊發現，女性和男性在表達時使用不同的語言系統。她們進一步整理出五種女性不同的認知模式：沈默（Silence）、被動的接受知識 （Received Knowledge）、主體的知識（Subject Knowledge）、過程的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及建構的知識（Constructed Knowledge）。[3] 這對當代講道學帶來新的啟發，進一步促使講道學者探索女性講道者與男性講道者有何不同。

---

[2] 根據一項數據顯示：在1972年將近10%的神學生是女性；在1987年超過27%的神學生是女性；在1998年33.6%是女性，其中29.9%是道碩課程；在1998年女性佔北美牧師人數的10%；在2010年，女性佔北美牧師人數的12%。

[3] Mary Field Belenky, Blythe McVicker Clinchy, Nancy Rule Goldberger, and Jill Mattuck Tarule, *Women's Ways of Kn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Voice, and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其四，女性講道學者的出現。當更多女性投入神學研究工作，她們各從不同的專業領域探討「女性與講道」這個主題，如：聖經詮釋、教會歷史、女性神學、心理學、溝通學等。此外，女性講道者的歷史及故事也開始被蒐集。在八十年代， 一些具影響力的女性講道學者（如Christine Smith, Lucy Rose, Mary Donovan Turner & Mary Lin Hudson等），從女性神學的角度提出對女性講道的觀察，[4] 並從女性不同的特質及認知方式之角度，提出深具女性觀點的講道學理論，如：蘿絲（Lucy Rose）提出的「對話式的（conversational preaching）講道」理論。蘿絲如此下定義說：「在對話式的講道中，講道者與會眾想像他們在一起探索上帝話語的奧祕……他們象徵性地聚集在圓桌（roundtable）旁，在那裏沒有頭，也沒有尾。」[5] 蘿絲並主張，講道是「講道者與聽眾建立連結和親密感的一種深度行為」，這與傳統那種「上對下」、講道者與聽眾分離（而非「連結」）的講道區隔出來。這種強調關係、不帶權威、不具強迫性的溝通方式，突顯了女性講道學者在理解講道上，與男性講道學者不同之處。這些女性講道者為當代講道學帶來許多新見解，也為基督教講道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二）「女性與講道」所涵蓋的重要主題

「女性與講道」在當代講道學的討論中，所涵蓋的重要主題可以根據構成一個「講道事件」主要包含的三個要素：講道者、聽眾、信息來理解。關於「聽眾」，這是當代講道學所關注的一個重要主題，強調講道者在決定說甚麼之前，必須先了解他／她的聽眾是誰，知道他們的需要，明白他們的問題和期待。講道者也必須意識到聽眾所處的情境，

---

[4] 像是Christine M. Smith在1989年出版 *Weaving the Sermon: Preaching i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89).

[5] Lucy Rose, *Sharing the Word: Preaching in the Roundtable Church*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34.

了解他們所處的文化及社會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思考方式以及價值觀。換言之，講道者不僅要對聖經作釋義，也要對聽眾作釋義。那麼，值得男女講道者深思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聽眾當中有60%是女性的話（事實上，這正是今日教會普遍的情況！），這將會如何影響他／她準備講道呢？正如學者已指出，男性與女性會使用不同的溝通模式，即所謂的「性別語言」。對男性講道者而言，在講道中如何把男性語言翻譯成女性語言，將抽象原則翻譯成關係的落實，在聖經詮釋上能意識到女性的角度與觀點，在講道中使用更多女性的例子和故事……這些都是講道者在準備講章時應該列入考量的。換言之，男女之間的溝通是一種跨文化的溝通。當代的一些講道學者，甚至根據前文中提及的女性五種不同的認知模式，提醒講道者該如何針對每一種不同的女性聽眾講道，好讓信息能更有效率地被接收。[6]

關於「講道者」，這是本文的重點，筆者將整理出「女性講道者」在北美講道學討論中涵蓋的一些重要主題，包括：聲音（voice）作為一種比喻、誰可以講道（關於女性的按立）、女性講道者不同的講道聲音，以及女性講道者如何找着自己的講道聲音。

三　聲音（voice）作為一種比喻

（一）「聲音」的重要性

當代的學者——無論是講道學者、神學家、或是歷史學家——在討論婦女在基督教會中的相關議題時，常使用的一個比喻就是「聲音」。女性講道學者特納（Mary Donovan Turner）及哈德森（Mary Lin Hudson）

[6] 見 Joseph R. Jeter, Jr. and Ronald J. Allen, "Preaching and Gender," in *One Gospel, Many Ears: Preaching for Different Listeners in the Congregation* (St. Louis: Chalice Press, 2002), 79-102。

在她們合著的《從沈默中被拯救：找着女性在講道的聲音》（*Saved from Silence: Finding Women's Voices in Preaching*）一書中，說明了「聲音」的重要性，以及它所代表的意涵：

> 「聲音」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來了解自我與世界，以及與上帝和他人的關係。它是獨特的。它可以召喚出真實的自我。這是自我權威的表達。有時它是抵抗的，但它總談論關係。它為世界開闢了新的觀念、新的行動和新的生活方式。聲音會顛覆。聲音會轉化。[7]

根據上述的這段引用文，「聲音」代表幾個重要的意涵：（1）獨特的自己：每一個人的聲音都是獨一無二的，透過聲音我們可以認出一個人。（2）真實的自己：聲音帶有真實的本質，即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認識自己，以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這也表示，一個成熟的個體在各種不同的關係中和處境中，會讓自己的聲音呈現前後一致性。（3）聲音是一種權威（authority）及權利（right）的表達：當一個人說話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觀點時，這是一種權威的表達。在人類社會的各種不同場域及關係中，經常出現的議題是：誰有權利說話？因此，當一個人被准許發言說話時，這表示：這個人的存在及價值是被承認的，甚至是被肯定的。而當一個人不被准許發聲的情況下，卻仍然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時，聲音就成為一種抵抗的力量。附帶一提的是，在之前提到的那本在八十年代深具影響力的著作《女性的認知方式：自我、聲音及心智的發展》，那些學者在描述女性不同的認知模式時，也是用聲音（而非「沈默」）作為婦女對自我的價值，以及與他人疏離或連結的方式。

---

[7] Mary Donovan Turner and Mary Lin Hudson, *Saved from Silence: Finding Women's Voices in Preaching* (St. Louis: Lucas Park Books, 2014), 17.

（二）「聲音」與基督教婦女

「聲音」這個比喻顯然是由「安靜／沈默」（silence）衍生而來的。在大多數的文化中，女性從小就被剝奪她們的聲音，沒有權利發言說話，其實在基督教會中也不例外，並從聖經中找到支持這種觀點的依據。兩段常被引用的經文，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四34～36）以及提摩太前書（二11～15）中的教導，主張婦女在教會中當安靜。不過，一些學者也指出：初代教會在這個議題上，呈現兩種不同傳統之間的張力——主流與非主流。彼得和保羅所代表的是主流教會的傳統，而稍晚在主後90至95年成書的約翰福音所代表的信仰羣體（「約翰團體」）則是非主流的教會傳統。關於這後者，抹大拉的馬利亞被稱為「第一位使徒」，初代教會甚至給予她「眾使徒的使徒」之頭銜，因為她是第一位見證耶穌基督復活的跟隨者。

從教會歷史的進程及發展來看，彼得與保羅所代表的主流教會傳統，反映了男性主導教會的局面，取代了約翰團體所代表的非主流教會傳統。不過，我們仍舊可以從一些外典文獻中聽到抹大拉馬利亞的聲音，如：第二世紀以希臘文寫成的《馬利亞福音》，將抹大拉的馬利亞與彼得對照。抹大拉的馬利亞因為與耶穌基督的緊密關係，引起其他男性使徒的妒忌，尤其是十二門徒的領袖彼得。[8] 最終弱勢的女性聲音——抹大拉的馬利亞，被佔優勢的男性聲音所淹沒。

四　誰可以講道？誰可以授權誰講道？

保羅的觀點背後的一個神學主張，主要是他對創世記二至三章的詮釋，認為夏娃因為軟弱受惡者的試探，引誘亞當陷入墮落之中。女性是夏娃的後裔，因此遭受生產之苦，作為對她們的懲罰。這樣的觀點從

[8] 林鴻信：《系統神學》（下）（新北市：校園，2017），頁1063。

早期教父開始就一直主導着教會對女性的理解。教會傳統總是把女性描繪成較次等的、附屬於男性的、天生較不聰明的和較不屬靈的。叫人不感訝異的是，二千年基督教的講道歷史是以男性為中心所寫成，而女性講道者的故事在教會歷史中一直被邊緣化或遺忘。

近年來在西方教會，由於一些學者的努力，蒐集並重建這些長期以來被忽略、被扭曲，甚至被污名化的女性講道者的歷史和故事。像是：十六世紀美國的清教徒婦女哈坎森（Anne Hutchinson，1591-1643），在當時被稱為「美國的耶洗別」，甚至暗示說她是「女巫」（witches）。當時反對哈坎森的彼得士（Hugh Peters）牧師對她的指控是：「妳已經越過妳的位置（You have stept out of your place），寧可做一位丈夫而不是一位妻子，一位傳道人而不是一位聽道者，一位裁判官而不是一個臣屬的人。」[9]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千年教會歷史中，在不同的時期，都有男性神學家或傳道人針對這個傳統理解女性的觀點，提出反思；舉例來說，十六世紀的改教家加爾文。根據他的提摩太前書二章11至15節之講章，也就是那段禁止婦女在教會中講道的經文，加爾文這樣說道：「保羅在這段經文中並沒有想用這些教導綑綁人們的良心。反倒是，上帝有自由把聖靈澆灌在婦女的身上，呼召婦女教導、講道，或治理。當男性沒有實現他們的責任及角色，或是當情況因男性的罪而受到混亂時，上帝使用一位女人的呼召去教導或治理男人，來懲罰男性的不信實。」[10] 在其他的注釋書及講章中，加爾文引用抹大拉的馬利亞、百基拉、腓利的四個女兒以及其他人，來證明聖靈如何自由地打破傳統的次序，呼召婦女教導及預言。他說：「上帝自由地選擇世上那些軟弱的，叫那些自高的

---

[9] Susan Hill Lindley, *You Have Stept Out of Your Place: A History of Women and Religion in America*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5.

[10] 這段引用文出現在 Jane Dempsey Douglass, *Women Freedom & Calvi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5), 55。

男人羞愧。」[11] 顯然地，加爾文詮釋這些聖經的方式表達了他對「上帝的主權」之理解。

另外一個例子是十七世紀著名的新英格蘭清教徒牧師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提及當時婦女與男性的不同，馬瑟牧師觀察到婦女通常都待在家中，比起忙碌工作的男性，她們有更多時間追求關於靈魂的事。也因此，針對婦女必須遭受生產之苦，以及生產所帶給她們的死亡威脅，馬瑟牧師卻提出獨到的見解，認為夏娃的咒詛反而變成對婦女的一種祝福：

> 上帝聖化她們對死亡的恐懼……她們經常面對死亡；這讓她們準備死亡，這教導她們活着。在她們命定的悲痛中，在她們生命中那些可疑的危險，更頻繁地驅使她們，把自己託付給她們唯一的救世主。她們通過生育得救；因此異乎尋常地迫使她們繼續在信仰、慈善救濟，和聖潔上保持清醒。[12]

隨着近代西方社會民主意識的抬頭，美國婦女在十九世紀末開始爭取婦女的投票權。十九世紀末興起的婦女運動，緣起於教會婦女代表在支持黑人權利的會議中，竟被拒絕入場參加。那時她們才警覺到，原來婦女的處境與黑人一樣，沒有平等的地位與權利，於是開始發起婦女參政運動，爭取婦女的投票權。換言之，在美國近代的教會歷史中，婦女運動與黑人人權運動，二者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二十世紀下半期開始在美國發起的婦女運動，同樣也是受到六十年代黑人人權運動的啟發及影響。與這些婦女運動同時發生的是，婦女對基督教信仰的重新檢驗和批判，以及對聖經的重新詮釋。

當婦女在公共領域爭取到投票權之後，進一步促使女性傳道人開始反思婦女在教會中的地位及權利，爭取婦女在教會中的投票權，即女性能夠被按立（ordination）成為牧師，在宗派議會中成為正議員，一同參

---

[11] Douglass, *Women Freedom & Calvin*, 54-55.

[12] Lindley, *You Have Stept Out of Your Place*, 24.

與教會的決策及領導。正如美國當代的歷史學家澤克蒙（Barbara Brown Zimund）指出，惟有當婦女得到重要的權利和權力時，婦女才能真正發揮影響力，如此一來教會對婦女的認可才算有所進步。誠然，這會大大觸動教會的體制，不免造成一些男性牧者的不適應，甚至是抗拒。然而，教會若能趁機反省其信仰，並勇敢地做出相對應的改革，勢必會對教會帶來更新的力量，一個最佳的例子就是在十九世紀第一位被按立的美國長老教會女牧師伍斯爾（Louisa M. Woosley）。

伍斯爾所屬的神學傳統在當時不接納女性傳道人，不過她的教會（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認出她身上有「從上帝而來祕密的內在呼召」（secret internal call of God），並從她帶有能力的宣講中印證了這呼召，在1889年按立她為牧師。這是一個在體制外先被按立，之後才被正式接納進入宗派體制中的案例。在被按立兩年後，伍斯爾出版了一本書《婦女該講道嗎？》（*Shall Woman Preaching? Or the Question Answered*），在書中她從聖經的、社會的、神學的角度討論並主張婦女應該講道。在此書的最後一章，伍斯爾更分享她身為一位女性，如何努力掙扎找到自己聲音的故事。[13]

女性的按立在講道學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關於「講道者的權威」的，也是在基督教講道歷史中一個經常被提出關於宗教領導權的問題：誰可以講道？誰又可以授權誰講道？同樣的議題，曾發生在中世紀教會體制外興起的一羣行乞修士的身上（如聖法蘭西斯修會、道明會），以及在十八、十九世紀非裔美國的講道者身上，即一羣從未受過正規神學教育的人，一羣不被教會或社會認可的弱勢者，是否可以講道，哪怕他／她們身上帶着聖靈恩膏的大能？這些問題背後最根本的神學問題則是關乎教會如何回應上帝的主權、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創造、上帝的形象等問題。

---

[13] Louisa M. Woosley, *Shall Woman Preaching? Or the Question Answered* (Cumberland: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2018).

五　女性講道者是否有不同的講道聲音？

當更多女性加入教會宣講的行列，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女性講道 （woman preaching）的本質是甚麼？更具體地說，女性講道者與男性講道者有所不同嗎？在1979年，一羣女性傳道人在華盛頓的「講道者學院」（The College of Preachers）舉辦了一場「女性與講道」研討會。這個會議是一個重要指標，因為在這之前，有關「女性講道」這個主題的研究非常少。當時大約有三十位女性傳道人從美國各地前來參加這個會議，此研討會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改進她們的講道。在會議之前，每位學員需要在她的教會先完成一份簡單的問卷調查，請會友描述男性講道與女性講道的不同。

這份問卷所關切的幾個問題是：女性講道是否有自己的特色？當聽眾聽到女性講道時，是否與男性講道不同？在教會中，聽眾是否帶有一種從文化而來對女性聲音的抗拒？[14] 大會根據所蒐集到的150份問卷資料，分別從內容、傳講及風格三方面，整理出聽眾對男女講道者的不同看法。有趣的是，在十五年後（即1994年），大會使用相同的方法及問卷內容，又做了一次研究調查。根據前後兩次的調查結果做比較，可以整理出下列幾個觀察：

1. 1994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描述男女講道的特色所用的字詞，比1979年有更多的共通性。舉例來說，男女講道在講道的內容上都是：thought-provoking、 relevant、biblical。不過，男女講道二者之間的差異也很顯著，knowledgeable、 scholarly、informative等字用來形容男性講道的內容，而personal、innovative等字則用來形容女性講道的內容。

2. 男女講道者在講道內容上差異不大，但在傳講及風格上顯示有所不同。在傳講上，男女講道者都被認為是inspiration。不過，男性講道者比較forceful，而女性講道者則是evoking emotion，且比較直接。另

[14] Lee McGee, *Wrestling with the Patriarchs: Retrieving Women's Voices in Preaching*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6), 26-27.

外，男性講道者被描述為distant、less personal，而女性則是personal、relational，並且男性的風格是authoritative、formal，而女性的風格是nurturing、caring、compassionate。換言之，在風格上，女性講道者比男性講道者更突顯情感及關係的特質。

3. 整體而言，聽眾在1994年對女性講道者的描述比1979年更為正面。一開始當女性在教會中講道時，她們所面對的會眾往往是對女性講道不熟悉， 甚至對這種新的、不同的講道聲音有所抗拒，連女性聽眾也不例外。不過，從1994年的研究結果發現，聽眾對女性講道者的描述似乎比1979年更為正面，這無非是一個好現象。

造成此種改變的原因有許多，像是：隨着女性傳道人的人數增多，會眾在教會中有更多機會認識女牧師的事奉，這不僅會幫助會眾更加接納女牧師，以及女性講道者這個概念，也會讓會眾對這股不同的講道聲音更加熟悉。此外，林意利（Susan Hill Lindley）在*You Have Stept out of Your Place: A History of Women and Religion in America* 一書中也指出，在八十年代當第一波按立的女牧師進到地方教會及宗派的結構後，在1995年以前，一些女牧師已經在教派中擔任最高職位。[15] 女性傳道人在教會中的優秀表現，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會眾對女性講道者的觀感及接受度。

六 女性講道者如何找着自己的講道聲音？

對女性講道者而言，她們最終想知道的是：做一個忠實的女性講道者，這代表的又是甚麼？麥吉（Lee McGee）在*Wrestling with the*

[15] 美國信義會選了兩位女性主教，聖公會有四位女性主教。許多長老會的女牧師擔任中會議長，或是中會的總幹事。美國衛理公會的紀錄更是超前，在1992年以前已經有八位女性主教，以及超過八十位的教區負責人。見Susan Hill Lindley, *You Have Stept out of Your Place: A History of Women and Religion in America*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423。

Patriarchs: Retrieving Women's Voices in Preaching 一書中指出，成為一位真實的女性講道者並不容易，這不單是女性個人的經驗，還包括其他的困難和挑戰，像是基督教傳統對女性的觀點、我們的文化對權力的理解，以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等。也因此，麥吉主張：如果女性要找着自己獨特且真實的講道聲音，就需要多元地開發及訓練（discipline）。在書中，麥吉提供了四面向的理解，包括：教會歷史、發展心理學、行為心理學，及靈性（spirituality）。[16]

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相較於男性，女性比較注重關係，這是在青少年時期發展出來的一種特質。為了得到同儕的接納，女性往往不敢表達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換言之，女性從青少年開始就漸漸失去自己的聲音。因此，從女孩轉變成女人，其中一個極重要的特質就是能夠勇敢地、感到自在地、自信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若套用在講道上，講道是要說出自己的觀點，這對許多女性而言是一大挑戰， 就好像赤裸裸地將自己呈現在他人的面前一般，令她們感到非常不安。

所以，對女性講道者而言，如何找回自己的講道聲音，好讓這個聲音是忠於上帝、忠於信仰羣體、能被文化所認同並接納，同時又能真實於自己的身分認同 （identity），這是一大挑戰。它是一個經歷對抗自我，以邁向蛻變成長的過程。那麼，女性講道者如何找着自己的講道聲音呢？

（一）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個人性及羣體性的聆聽

「聆聽」對講道非常重要，但也是最難操練的一項功課。正如麥吉在她的書中精準地指出講道者的問題：「一個經常與他人溝通的生命——不管被接受或不被接受，這非常需要個人的精力。這種持續維持溝通的精力消耗，會讓一個人失去關注自己內在生命、內在認識，以及內

[16] McGee, *Wrestling with the Patriarchs*, 52.

在聲音的能力。」[17] 因此，如何在說話與聆聽之間保持平衡，這對成為一位好的且能帶出影響力的講道者，是非常重要的操練。因為講道是要說上帝要我們說的話，而不是說自己想說的話。

對女性講道者而言，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顯得更為重要。對長期處在一個不被聆聽、不被信任的社會文化氛圍中的女性而言，她需要透過自我的察覺，才能找出失去自己聲音的原因。同時，她也需要聆聽上帝在聖經中的聲音，認識自己是誰，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並不斷地經歷從上帝那裏來的愛與醫治，這樣才能漸漸找回自己身為一位女性講道者的健康和自信。

那麼，女性講道者如何聆聽自己、認識自己、找回自己喪失的聲音呢？這可從兩方面進行：個人的聆聽，以及羣體的聆聽。關於「個人的聆聽」，女性講道者可以善用一些資源，像是：獨處、默想、寫日記、禱告、心理諮商、從事有創意的藝術（如音樂、文學、電影、畫畫等），以及與他人有一個親密的對話。

至於「羣體的聆聽」，女性講道者則可以透過「支持成長小組」，一起分享並聆聽他人找回自己聲音的故事和經驗。這也是女性與男性不同之處；女性通常是透過說話或分享，來釐清自己的看法。這樣的「支持成長小組」可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在神學院、在地方教會、在退修會，或研討會中等，譬如：在神學院的講道課堂之外，或是在女性傳道人的退修會或研討會中開始組成這個小組，之後每個月或隔周聚會一次。在這個小組中，成員可以分享，在準備講章的過程中說出自己聲音時遇到的困難；會眾聽完這篇講章後的回應；與其他男性同工及牧者服事的經驗中，如何感受到自己的聲音被拒絕；聆聽他人找回自己聲音的故事與經驗等。筆者自己曾參加過的「支持成長小組」，則是強調文字的寫作，鼓勵女性講道者透過文字表達自身的經驗和感受，特別是藉由詩的創作。

---

[17] McGee, *Wrestling with the Patriarchs*, 86.

這種「支持成長小組」若要有效地進行，一個重要關鍵是成員彼此之間必須建立足夠的信任感。由於每位女性傳道人所處的情況不同，所以要學習相互尊重，不要太快給予他人批評或意見，而是聆聽及陪伴，才不會讓「支持成長小組」變成另一個讓女性失去自己聲音的地方。

（二）從古今中外找到一些女性講道者的典範

女性講道者找着自己的講道聲音的另一個做法，是從古今中外去找一些女性講道者的典範（role models），特別是那些拒絕所有力量要她們安靜的信仰先輩，看她們如何使用上帝所賜給她們的聲音。很遺憾的是，華人教會在這方面的資料非常有限，這個事實也突顯了女性講道者的聲音長期以來不被華人教會所重視。台灣的女性神學家高天香教授指出，「（亞洲教會）……婦女史的缺乏及婦女經驗的被遺忘，使婦女的存在變得無根，不知道自己的身分認同，不知道自己過去的成就，也不知道自己過去的苦難。因為缺乏自我的身分認同，因此也就不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18] 如何開始蒐集並建構華人教會的婦女奮鬥史，是當今華人教會及基督徒歷史學家一項重要的神學工作。

筆者自己是透過閱讀一些西方教會女性講道者的故事，特別是美國女性講道者的故事，來補足在自身文化中這部分的不足，比如：Anne Hutchinson (1591-1643)、Sarah Osborn (1714-1796)、Louisa M. Woosley (1862-1952)、Lucretia Mott (1793-1880)等。從這些女性講道者身上可發現，她們都有幾個共通點：當上帝的呼召臨到她們時，都經歷從不可置信、拒絕，到接受的掙扎歷程。她們都非常專注聆聽上帝在聖經中的聲音，同時也非常專注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雖然她們在回應上帝呼召時都面臨從外來的打擊，甚至是逼迫，以及家人的不諒解、甚至拒絕，但最終她們都勇敢回應上帝的呼召，並在必要時為自己所領受的呼召辯

[18] 高天香：《推倒隔絕的牆——婦女神學家高天香教授的生命篇章》（台北：台灣神學院，2008），頁202～203。

護。她們都善用上帝賜給她們在講道及教導上的恩賜，成為出色的宣講者。當筆者閱讀這些西方教會女性講道者的奮鬥史時，也訝異地發現：自古以來女性講道者所面臨的困境似乎都很類似，且有一種連續性，已經跨越了文化的差異。也因為如此，華人的女性講道者也能從這些西方教會的女性講道者中得到共鳴和啟發，並從她們的奮鬥史中找到身為女性講道者的勇氣。

七　結論：北美講道學在「女性與講道」上的研究帶給華人教會及神學院的啟發

今天，華人教會整體而言信徒的性別比例是女性高於男性，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婦女領受上帝呼召進入神學院就讀，接受神學教育的比例，一定會呈現有增無減的趨勢。以筆者所屬的宗派來說，根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教勢統計，信徒總數的男女比例大約為五比六，女信徒比男信徒多兩成。目前在神學院就讀的神學生，男女的比例大約為八比九。當愈來愈多女性進到神學院就讀，接受傳道人的養成及裝備時，「女性與講道」這個主題已經是華人教會及神學院不可不正視的一個課題。從北美講道學在「女性與講道」這個主題上的研究成果讓我們看見，女性講道者若要找回自己失落的聲音，這不僅是女性講道者自身的工作，更是整個信仰羣體的工作，包括：神學院、基督徒學者、教會、傳道人與平信徒。在此，筆者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一）華人基督徒學者必須從聖經、神學、歷史、實踐等角度進行跨領域的研究，以幫助華人教會重新反思過去以來教會對女性的觀點

北美講道學在「女性與講道」這個主題上的討論，不只是關於女性的議題，更是全面地檢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精神及教導，以及它對現代的意涵。基督徒學者（特別是女性學者）在這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他們各從不同的專業領域，對這個主題進行研究，並透過研討會及書籍的出版，補足長期以來教會在這個主題上的研究不足，同時進一步修正教會傳統對女性的錯誤詮釋。

長期以來，華人教會的神學深受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所影響，因此忽視女性的觀點和經驗。過去這幾十年來，華人女性已經積極進入神學的各領域受裝備。在今天，無論是舊約、新約、教會史、系統神學、講道學等，都已有不少華人女性從事學術研究。期待藉由女性觀點的加入，能矯正、平衡，或補充以男性為主導的神學，進而為華人教會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更期待男女的華人基督徒學者能從聖經、神學、歷史、實踐等角度，針對「女性與講道」做深入的研究，以幫助華人教會反思過去以來教會傳統對女性的觀點，華人教會女性講道者的歷史及故事的搜集與建構更是刻不容緩。這些女性講道者的奮鬥史，不僅能補足華人教會歷史長期以來的缺陷，也能幫助華人的女性講道者找回自我的身分認同。

（二）教會應該歡迎、鼓勵、承認，並學習聆聽女性講道者的聲音

除了基督教學界的努力之外，這也涉及教會如何歡迎、鼓勵、承認，並聆聽婦女的聲音。華人文化對女性聲音較不尊重，甚至是抗拒。然而，今天在社會中當各行各業都已經出現女性主管、女性領導者時，相較之下教會對女性的尊重似乎比社會的腳步慢。華人教會的傳道人與平信徒（無論男女）都需要在這個議題上一同學習並突破。

過去教會傳統強調創世記第二、三章作為理解女性在教會中的地位之依據，但一些學者也提醒教會：不可忽略創世記一章27節的話說：「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創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創造他們；他創造了他們，有男有女。」無論男女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被造的。因為罪，這個形象遭受扭曲，但因着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拯救，讓這個形象得以重新被恢復。福音為教會帶來一種新的創造，新的次序，正如保羅在加拉太書

三章38節所說的：「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成為一了。」

所以，如果女性講道者要找回自己的聲音，這需要教會一齊努力。教會認出婦女身上有上帝的呼召與恩賜，願意歡迎女性的聲音，並以開放的心接納並聆聽女性作為講道者及領導者的聲音。筆者在文中提及的伍斯爾牧師，這位美國長老教會第一位受按立的女牧師，她的教會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在2014年慶祝伍斯爾牧師受按立滿125周年時，重新出版她在1891年的那本書，但把原本的書名《婦女該講道嗎?》（*Shall Woman Preaching?*）更改為《婦女應該講道》（*Women Shall Preach*），以此作為教會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對「女性按立」的一種發聲及見證。

（三）男人與女人是一種夥伴關係（partnership），教會需要男性與女性的講道者，才能培育更健康的下一代

從教會歷史的角度來看，從初代教會開始兩性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着，無論是神學主張（誰有權利詮釋聖經及基督教信仰？），或是宗教領導權（誰可以講道？誰可以被受職按立？）。不過，基督信仰強調人是活在「關係」中，首先人與神的關係，並以此關係作為基礎，進而活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不但如此，人對自我的認識往往是在「關係」中被定義（如：男人是因為女人而定義，女人也是因為男人而定義），同時人的獨特性也是在「關係」中才能發揮出來的，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11節主張說：「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人不可沒有男人，男人也不可沒有女人。」所以，男人與女人是一種夥伴關係（partnership），而不是競爭關係。[19] 從美國的女性講道者奮鬥史中，我們看見男性傳道人

[19] 舉例來說，在1911年9月1日至1912年4月1日，在美國發起的「男性與宗教奮興運動」（Men and Religion forward Movement），認為十九世紀的宗教奮興運動讓基督教信仰變得太女性化，而把男性推向教會之外。因此，這個活動是一個企圖重新恢復男性特質基督教的一個跨宗派運動，這也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排除婦女參加的宗教奮興運動。

扮演重要的角色。當婦女面對不公義的對待，他們基於信仰的良心及反省，勇敢說出與其他人不同的聲音，並對婦女身上的恩賜給予肯定，歡迎並接納她們一同參與在宣教事工中。這些男性傳道人的聲音，也成為一種先知式的聲音。

再者，在2018年出版的 *She Preached the Word: Women's Ordination in Modern America* 一書，針對教會領導者的性別會如何影響下一代，做了深度的研究及探討。研究指出，當一個孩童看見一個行為典範完全是男性或女性時，他們會內化那個行為。如果孩童更多看見教會領導者皆為男性，那麼他們就會更多以為領導者的角色一定是男性。研究也指出，如果婦女在年經時有女性的教會領導者出現在她們生命中的話，在成人後她們的自我價值感相對比較高。[20] 由此可見，女牧師或女性的教會領導者對信徒（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有着深遠的影響；本書的一個主要目的是重申，為何要支持女性被按立為牧師。遺憾的是，大多數華人教會的信徒都是在「單親的」教會家庭中長大。許多人在信仰養成的過程中只有講道父親，沒有講道母親，這是值得今日華人教會省思的一個問題。

（四）神學院的講道學教育必須更敏感於性別的差異，以幫助神學生找着自己的講道聲音

北美講道學在「女性與講道」上的研究成果，提供華人神學院的講道學教育幾個重要的提醒：（1）女性有屬於她們獨特的認知方式，女性和男性在表達時使用不同的語言系統，女性講道者與男性講道者因此有不同的講道聲音，無論在內容、傳講及風格上都有所不同。（2）由於女性從青少年開始就漸漸失去自己的聲音，再加上華人社會整體對女性聲音的不重視，甚至是抗拒，對許多女神學生而言，要成為一位講道者，

[20] 見 Benjamin R. Knoll and Cammie Jo Bolin, *She Preached the Word: Women's Ordination in Moder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在眾人面前說出自己的看法，可能會是一大挑戰。因此，神學院的講道學教育者需要更敏銳於女神學生的需要，並在講道學課程的設計上，幫助並鼓勵她們找回自己失落的聲音。

筆者從事講道學教育至今已十二年，從過去的教學經驗中發現，找着自己的「講道聲音」無論是對女性或男性的神學生或傳道人而言，同樣都是一項重要的功課。舉例來說：一次在課堂的講道練習中，一位男學生一上講台講道就會變成另一種聲音。他是一位才三十出頭的年輕神學生，但他的講道聲音聽起來就像一位六十多歲的老牧師在講道一樣。進一步了解後發現，這就是他母會牧師的講道方式，在耳濡目染之下，這位神學生以為這樣的講道聲音才具有權威。

對一些女性傳道人而言，由於她們在成長過程中只有講道父親，沒有講道母親，以致於她們的講道聽起來就像男性講道者一樣。這樣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伍斯爾牧師的身上。學者針對她的講道研究提出這樣的觀察：

> 她（伍斯爾）作為宗派的第一位女牧師，在外表及風格上是非常獨特且例外的。她以公開方式為自己被呼召成為一位女性講道者的權利作辯護。然而，在她的神學及講道的風格上，她的溝通方式就像男人一樣。她的女性聲音使用了能被全國男性聽眾聆聽的語言及修辭。如果這是她唯一聽過的宣講上帝話語的男性聲音，你又如何能期待她聽起來會不一樣呢？如果她與當時傳統的講道風格不同，她的聲音還能被普羅大眾接受嗎？她發出了聲音，但同時她也是安靜的，這是伍斯爾故事的諷刺（irony）之處。[21]

所以，女性講道者如何找着自己的講道聲音，除了與自我認識、自我接納有密切的關係之外，也要面對社會文化及聽眾的期待。如何在講道中表達前後的一致性及適切性，這無論對女性講道者或男性講道者而言，都是一生必須去面對的挑戰。

---

[21] Turner and Hudson, *Saved from Silence*, 76-77.

撮　要

「女性與講道」從八十年代開始是北美當代講道中一個重要的主題。相較於北美教會在這方面的研究及成果，它對亞洲的華人教會而言仍是一個不太被重視或探討的課題，儘管女性傳道人的人數不斷增加。在本文中，作者採用講道學方法論，把焦點放在「女性講道者」這個要素上，整理出當代講道學討論中所涵蓋的一些重要內容，包括：聲音（voice）作為一種比喻、誰可以講道、女性講道者不同的講道聲音，以及女性講道者如何找着自己的聲音。期待藉由此論文能喚起華人教會對這個主題的關注，進而帶動學者能從各個不同領域對這個主題的研究，以補足亞洲華人教會在這方面的不足。在本文的最後，筆者進一步提出北美當代講道學帶給亞洲華人教會之啟發。

ABSTRACT

"Women and preaching" has been an important theme in contemporary preaching in North America since the 1980s.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it is still a topic that is not much emphasized or discussed for the Chinese church in Asia, regardless of the rising number of woman minister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dopts a homiletic method and focuses on the element of "woman preacher," sorting out some important issues covered in contemporary homiletical discussions, including voice as a metaphor, shall women preach, woman preachers' different preaching voice, and how woman preachers find their own voice.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ll draw more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 and in turn encourage more scholars to study it from various fields so as to complement the insufficiency in Christian scholarship in the Chinese church of Asia.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further proposes what the Chinese church in Asia can learn from contemporary preaching in North America.